

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新态势及其影响

——基于台湾 2014 年与 2016 年两次选举分析

黄继朝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摘要]近年来,在经历了“反服贸”“白衫军”等一系列社会运动之后,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发生了显著变化,集中体现为2014年“九合一”选举与2016年的“总统及立委”选举中青年的踊跃投票参选现象。目前,台湾青年政治参与呈现出一些新特征:政治参与广度与强度的提升;从动员参与走向自动参与;青年政治参与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呈现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并存状态;网络新媒体成为组织参与的重要媒介。台湾青年政治参与新态势势必对台湾政局以及两岸关系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对台湾传统的政党政治产生一定冲击;其次直接推动与加快台湾主要政党的革新化与年轻化转型;最后,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扩大有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战略的社会化与再教育过程。

[关键词]台湾青年;政治参与;新态势;选举

[中图分类号]D4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6)06-0096-08

2012年以来,台湾青年群体主导的社会运动日益频繁。在经历了“白衫军运动”“反核四运动”尤其是“反服贸运动”之后,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2014年“九合一”以及2016年的“总统立委”选举中。关于当代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新变化,目前学界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还不是很多,尤其是结合2016年“总统立委”选举来进行深入分析更是有待加强。鉴于此,本文主要运用政治参与的相关理论,然后结合2014年与2016年台湾的两场重要选举,尤其关注2016年的“总统立委”选举,对于当代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新态势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系统分析。据统计,当前台湾20岁至39岁的青年人数超过700万,是左右乃至决定选情的关键力量,青年政治参与将直接影响台湾政治发展的未来走向。因此,系统分析当代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新态势及其对台湾政治、两岸关系的影响,对于研究台湾政治以及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走向将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一、概念界定与理论探讨

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一般认为政治参与指的是平民试图影响政策的活动^[1]。其内

[收稿日期]2016-07-14

[作者简介]黄继朝,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湾青年问题。

涵主要包括：政治参与仅包括行动而不包括态度；政治参与是指平民即非政治职业者的（或政治职业者的非角色化的）活动；政治参与不仅包括参与者在自愿基础上自发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而且也包括参与者受他人策动而进行的影响政府的活动；政治参与包括合法的与非合法的活动，或者说制度外与制度内的参与途径都包含在内。另外，影响政治参与的因素有很多，从宏观来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公民政治参与的总体水平，而从微观来看，政治热情、政治效能感、现状满足感、参与成本等则是影响公民个人或特定群体、团体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2] 本文探讨的台湾青年政治参与主要是指台湾普通青年为了试图影响政府决策，自发或被动地去参与选举、投票、示威、游行等政治行为，其中投票、选举作为现代民主政治参与的最核心内容，是本文的主要考察层面。关于台湾青年群体的界定，学界有诸多标准。本文主要将台湾青年限定在当前20-39岁的人群，因为他们可以说是一个新世代，他们经历了台湾社会政治的变迁，省籍族群意识淡薄，同时还经受了网络新时代的洗礼，信息获取更加现代化与多元化，体现出区别于39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的鲜明特征。

政治参与的方式主要包括投票、选举、社会运动以及主动接触与信访等。不同于投票、选举等成熟理性的体制内参与活动，社会运动是一种无序、偏激甚至是诉诸暴力的体制外政治参与方式，特定限度内的社会运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政治参与的提升，因为社会运动所需的最低程度的组织有助于建构社会共同意志、培育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培养政治精英和创新组织方式，一定限度内的社会运动有助于促进政治系统的民主化。^[3] 另外，社会运动还将直接对公民的政治热情、政治主体性、政治效能感、政治技能等影响政治参与的因素产生重要作用。近年来，正是青年主导的一系列社会运动，成为推动台湾青年政治参与发生变化的主要力量。2014年“反服贸运动”之后，台湾青年原有的政治冷漠现象有明显转变，逐渐从“远离政治”转向“参与政治”。

二、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新特征

近年来，随着台湾内外环境的变迁，在一系列社会运动的直接推动下，当代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发生了显著变化。整体来看，台湾青年对普世价值追求的政治热情爆发出来，长时期迷茫的台湾青年开始逐渐走出政治边缘地带，他们逐渐脱离原有的封闭生活，摒弃原有冷漠的政治态度，走向公共领域，积极参与投票、选举、游行等政治活动，力图影响公共政策，推动或反对一定的社会政治变革。

（一）台湾青年政治参与水平显著提高

在分析政治参与水平的时候，经常从两个方面来进行探讨：一是广度，即从事某项政治参与活动的人的比例；二是强度，即该种参与活动影响政治系统的程度和持续性，以及它对政治系统的重要性。^[4] 投票选举是现代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政治参与活动，也是政治参与水平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在此便通过台湾青年的投票选举活动来考察分析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水平。

从广度上来看，近年来，在一系列新社会运动的影响下，尤其是2014年3月青年学生主导的“反服贸运动”的直接作用，台湾青年参与投票选举的比例较以往有很大提升，集中体现在2014年的“九合一”选举与2016年的“总统及立委”选举中。从投票来看，两次选举中台湾青年群体的投票热情都异常高涨。目前，台湾20至39岁的青年选民约有700多万，已经成为选民群体的主要力量。据台湾智库民调结果显示，在“九合一”选举中年轻族群的投票率远高于过去平均六成左右的投票率，20-29岁族群的投票率为74%、30-39岁族群则为78.2%^[5]；而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虽然总投票率仅有66.3%为10年来最低，但20-29岁年轻族群有七成四（74.5%）的投票率，远高于平均总投票率。^[6] 值得关注的是两次选举中新世代“首投族”（年满20周岁首次拥有投票权）的踊跃投票情况。2014年“九合一”选举与2016年“总统及立委”选举中“首投族”分别有62万和129万“首投族”，他们投票意愿强烈，投票热情普遍较高，其中身在异乡、积极返乡投票者不在少数，这一族群又以在校大学生为主，各地车站选前都挤满了返乡投票的青年学生。此外，在2014年“九合一”选举以及2016年的“立委”选举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青年参选人，其中顺利当选的还不在少数。“九合一”选举中，民进党共推派47名青年候选人参选，最后15人当选，当选率超过三成，而其他绿党、树党等政治团体所推出的青年候选人也当选不少，甚至还有一些当选的青年还不到30岁。例如，现年25岁的薛呈懿当选宜兰县议员，成为全台最年轻议员；26岁的王浩宇，以意想不到的高票当选桃园市升格后第一届市议员，是“六都”中最年轻的市议员；还有29岁的陈纪衡代表树党参选，成功当选集集镇镇长，成为全台最年轻镇长。而在2016年

的“立委”选举中青年群体更是成为参选的重要力量,在很多选区都出现“新老对决”的局面,不少年轻人战胜老一代人成功“上位”,包括国民党籍的蒋万安和颜宽恒,民进党籍的吕孙绫、苏巧慧以及蔡易余。另外,代表青年新世代的力量更是一举拿下五席“立委”,成为“立法院”第三大党。

从强度上来看,台湾青年投票参选率的大幅提升,对2014年的“九合一”选举与2016年的“总统立委”选举的选举结果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台湾青年群体的选票逐渐成为决定选情、影响台湾政局的关键力量。首先,青年的广泛政治参与是导致“九合一”选举中国国民党“全线溃败”的重要因素。“九合一”选举中国国民党县市长从15席遽减到只剩6席,“六都”只留其一,民进党却由6席增加至13席,实属大胜,而在县市长投票率上国民党仅有40.5%,亦低于民进党的46.7%。国民党缘何惨败?究其原因包括很多,但青年选民是造成国民党选举翻盘的重要变数。与其他年龄层相较,长期处于经济困境但又充满活力的年轻族群对于马当局的表现更加失望,也更愿意支持民进党候选人。根据“新台湾”国策智库的调查显示,有58.4%的民众认为“九合一”选举国民党的挫败是被青年与公民力量打败。^[7]其次,在2016年1月的台湾“总统立委”选举中,青年群体更是成为左右选情的关键力量。在2016年1月的选举中,20岁至39岁的青年选民突破700万人,占总投票人数的37%,他们的抉择,对于最终的结果走向至关重要。根据台湾智库选后民调资料显示,20-39岁之族群,投票给国民党朱立伦的未达一成,有近九成支持蔡英文;对于区域“立委”投票行为的交叉分析也发现,20岁至29岁的年轻人有42.4%投给民进党区域“立委”,投给国民党区域“立委”的仅有13.5%。^[8]年轻族群支持度的大幅差距,是国民党“总统”及“立委”败选的主因。长久以来,由于就业困难、经济疲软的压力环境长期得不到改善,大部分台湾青年都对国民党与马当局的理念以及经济民生政策满怀失望和不满情绪,而国民党却总是对青年的呼声置之不理,不够重视青年工作。在经历了“白衫军运动”“反服贸运动”等社会运动之后,青年群体的参政意识得到激发,再加之民进党的刻意煽动,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用选票来表达对当局的抗议意见与失望之情。

2014年的“九合一”选举与2016年的“总统及立委”选举中台湾青年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除了与马英九执政以来台湾社会经济状况的持续低迷背景有关,更是直接受到“反服贸运动”为代表的一系列青年主导的新社会运动的影响。首先,在经历了“白衫军”“反核四”“反服贸”“食安风暴”等社会运动的训练和洗礼之后,台湾青年潜藏的政治热情被完全激发出来,在青年群体中逐渐形成一种反当局的共同意志,他们逐渐走出政治冷漠,走向公共生活,试图推动社会政治变革。其实长期以来台湾青年都积极关心政治,关注政府的实际作为,但多是停留在政治心理或政治态度的层面,而在社会运动的刺激作用下,一度被视为“政治冷感”的青年群体的政治激情被点燃,其政治心理、态度迅速转化为投票、选举等政治行动。其次,社会运动过程中青年群体还充分利用Facebook、Line、PPT论坛等新媒体进行组织串联,从而构建了各类简捷方便的社会关系网络,而这些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是青年参与投票、选举等政治活动的重要基础。最后,社会运动还培育了一批台湾青年政治精英,他们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活动经验与政治技能,在组织动员青年参与投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些人还开始积极参选公职,选择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试图通过体制手段来推动社会变革。

(二) 台湾青年从“动员参与”转向“自动参与”

通常来说:“政治参与不仅包括行动者本人自发的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而且包括行动者受他人策动而发生的影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前者可以称之为自动参与,后者称之为动员参与。”^[9]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面对转型之后的无序、黑暗、经济衰败、政党恶斗等问题,台湾青年深感失望与悲观,再加之当局推动很多违背青年群体意愿的举措,使得台湾青年虽然在政治心态上仍然积极关注政治变革,渴求政治、社会昌明,但是在政治行为上却长期都表现出一种“政治冷漠”的倾向,不愿接触政治议题、参加政治活动,主要反映在青年世代的投票率一直不高,尤其是“首投族”更经常是选民中投票率最低的人群。而数量庞大而且不断增多的台湾青年群体又是选民人数的主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选举结果的走向。因此,2014年之前在青年群体普遍“政治冷感”的背景下,各主要政党都积极通过引导、劝说或物质引诱甚至是威胁的方式来动员年轻人投票支持自己的政党,同时积极招揽鼓励年轻人才入党代表本党参选。例如,2012年“总统”选举中,民进党不仅通过催票短片与明信片、县市长造势等措施鼓动青年返乡投票,还专门成立青年军“BGroup”,积极拉拢“首投族”;而国民党则通过举办“两岸青年菁英人才培训班”,成立“赞青团”“建青团”等锁定工商子弟、年轻员工以及青年学子等族群,全面动员蓝军青年群体。在动员参与的情况中,青年党员、青年学生、青年职工等参加投票、选举、示威游行的政

治参与活动,并不是为了想表明自己对某政党或政府决定的支持,而是因为政党领袖、学校老师、企业老板要求或动员他们这样做,直接行为者本人并不抱有影响选举结果或政府决策的个人意图,但其他人如国民党或民进党领导人、亲绿或亲蓝教师以及蓝营或绿营财团,都抱有这种意图。

近年来,随着青年群体主导的新社会运动在台湾的兴起和发展,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也在逐渐从动员参与转向自动参与。青年在组织和参与“反服贸运动”“白衫军运动”“反核四运动”等活动的过程中,其政治主体性与政治效能感得到不断提升,从而更愿意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影响政府政策的活动。一方面,新社会运动的训练与洗礼,逐渐开启了台湾青年在政治上独立的思考与选择空间,激发了台湾青年群体自主的“公民意识”,相比于之前的盲目地被动员去投票选举,台湾青年在政治参与活动上有了自主的价值判断,多了政治自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在参与“反服贸运动”等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台湾青年更加相信自身参与行为影响政治体系和政府决策的能力。以前台湾青年的“政治冷漠”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因为他们觉得不论如何进行政治参与,也不会对政府决策产生任何影响,从而对政治感到无力而回避。而青年群体主导的“反服贸运动”“反核四运动”对当局决策变更产生的直接作用效应,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他的政治参与行为将会对政府决策和执行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政治效能感得到增强,进而自发地去参与影响政府的活动。在2014年“九合一”与2016年“总统立委”选举中,台湾青年在政治参与上都表现出很高的自发意愿,都迫切期待用自身的选票或者参选公职去推动社会政治的变革,尤其是大学生群体更是参与热情高涨,甚至还专门组织包车返乡投票。2016年1月,台大、政大等12所大学学生会就自发发起公民返乡专车活动,提供优惠票价或是免费,包车让大学生返乡投票。

(三) 台湾青年的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并存

根据参与行为是否符合制度化的程序和步骤,可以将政治参与划分为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非法参与一定是非制度化参与,但合法参与未必完全是制度化参与,不符合正当制度程序的合法参与也属于非制度化参与。2014年“九合一”选举之前,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多属于非制度化的参与,主要包括游行示威、静坐请愿以及暴力骚乱,例如“反服贸运动”“反核四运动”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台湾青年群体满怀激情、充满动力,同时亦很容易受到煽动,冲动行事,在国民党长期执政不佳,台湾经济持续低迷的社会背景下,民进党等绿营势力积极煽动社会“反马”情绪,把所有矛盾、问题都归结于马当局的无能、腐败甚至是两岸政策,在此影响下受到迷惑鼓动的台湾青年尤其是大学生群体纷纷走上街头,选择通过游行、示威甚至是暴力骚乱如“冲击立法院”等激进方式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情绪。值得强调的是,台湾青年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越多,台当局的政治不稳定性就越高,当局领导人面临的压力就越大。

同时应该看到,在参与和组织“反服贸运动”“白衫军运动”“反核四运动”等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台湾青年受到了政治参与活动的充分锻炼和影响,不仅政治自主性和政治效能感得到提升,而且还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活动经验,培养了有效的政治参与技能。由于“搞街头运动”难以凭借一腔热血长期维持,在非制度化参与的激情过后,拥有了一定政治经验和政治技能的年轻人开始逐渐回归理性,思考选择通过其他合理途径去参与政治,影响政府决策。鉴于此,许多台湾青年开始从体制外转向体制内,从街头走向投票点与演讲台,期待通过制度化参与方式如投票、选举来实现政治理想,推动台湾社会的变革。2014年与2016年两次重要选举中青年群体投票参选率的大幅提升就体现了台湾青年政治参与从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的显著态势。青年群体一向激情澎湃,可塑性强,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在一些政治势力的刻意鼓动下,台湾青年难免还会走向街头,青年的非制度化参与依然存在,再加之台湾政治体制制度化的缺陷,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可能主要还是呈现非制度化和制度化两种参与并存的局面。

(四) 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组织动员方式的新媒体化倾向

在早期的台湾政治参与活动中,不论是体制内的投票、选举,还是体制外的游行、示威、静坐请愿等,其组织动员过程基本都是通过造势演讲、扫街拜票、基层走访等途径来实现,其组织媒介主要是海报、传单、广播、电视等传统工具。青年群体作为台湾的新世代,他们的成长大多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网络时代的兴起和发展,相对于利用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工具,他们更倾向于通过Facebook、Line、PTT论坛等网络新媒体工具来进行沟通交流与获取信息。与传统传媒工具相比,网络新媒体的传播范围更广,信息传递速度更快、更及时。早期政治参与组织动员形式与台湾青年信息获取方式之间的隔阂,亦是直接导致之前台湾青年“政治冷漠”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在全球化网络新媒体时代的大背景下,受网络时代熏陶的台湾青年群体在政治热情的激励下,

逐渐开始摆脱原有的传统政治生活模式,发展出基于网络新媒体的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台湾青年在参与“反服贸”“白衫军”等社会运动的过程中,不再依托传统动员模式,而主要是通过网络新媒体工具来进行组织动员。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运动,这种基于网络新媒体的组织动员形式得到不断训练和发展,逐渐走向成熟。在2014年的“九合一”选举和2016年的“总统及立委”选举中,网络新媒体工具也是组织动员青年参与投票选举的重要渠道,对于青年的政治参与行为具有突出显著的影响作用。比如“周子渝”事件就是通过网络媒体的广泛传播,从而催动大量年轻人出来投票。网络新媒体传播范围广泛,传播速度迅速,简捷便利,具体来说:一方面,可以推动台湾青年之间形成许多高效、便捷的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而这些社会关系网络是台湾青年组织动员活动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网络新媒体还大大降低了台湾青年参与政治的成本,通过充分利用新媒体交流工具,青年群体不必去通过报纸、电视或参加造势活动等来获取政治信息,不用付出太多时间或金钱成本,就能实现更快捷、更广泛地获取、传播以及讨论政治信息与内容,进而更加轻松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

在2014年“九合一”选举和2016年的“总统立委”选举中,Facebook、Line、PPT论坛等新媒体成为青年选民之间关于参选人政见、具体政策等交换信息和展开讨论的主要平台,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广泛性和敏捷性很容易在青年群体间形成一定导向性的社会舆论,从而影响青年选民的投票意向,同时新媒体的便捷性还能直接增进青年选民与候选人之间的沟通交流,进而直接影响青年选民的投票选择。两次选举中国民党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重视网络新媒体对青年选民的重要影响,虽然在党内也成立了网络与新媒体部门,但在具体操作上多流于形式。而无党籍政治“素人”柯文哲当选台北市市长更是离不开“婉君”(网军)的支持,其竞选团队充分利用Facebook、PPT论坛等网络资源扩大宣传、博取认同,积极拉近与青年网民的距离,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总之,进入新媒体时代,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组织动员形式在不断创新发展,随着信息传播手段的快速发展与现代化,青年群体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将得到不断丰富完善,青年参与政治的成本将会逐渐降低,青年群体的组织动员将会越来越便捷高效,相互间“串联”可轻触指尖瞬时完成。

三、台湾青年政治参与新态势对台湾政局、两岸关系的影响

近年来,在台湾青年群体主导推动的“反服贸”“反核四”等新社会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呈现出积极热情的新态势,青年逐渐走出“政治冷漠”,走向体制内的公共生活。同时,这种台湾青年踊跃参政的新态势也势必会对台湾政治生态以及两岸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台湾传统的政党政治

政治参与作为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其变化也必将会对政治生态产生深刻的影响。“反服贸运动”等社会运动之后,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新动向对于台湾传统政党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台湾传统蓝绿对立的“两党制”格局所带来的冲击效应。21世纪之前,台湾政坛主要是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自2000年实现首次政党轮替以来,逐渐形成了蓝、绿两大政党联盟为特征的“两党制”政治格局,国民党与民进党两个主要政党轮流上台执政。2014年年底“九合一”选举之前,台湾蓝绿对立的“两党制”格局一直都较为稳固,“九合一”选举中,青年群体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及一些无党派人士的当选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以新世代与公民力量为主体的第三势力的崛起。无党籍参选人柯文哲依靠青年选票在台北市市长选举中大胜国民党参选人;25岁的绿党参选人王浩宇通过网络粉丝团高票当选桃园市议员等现象的出现,说明了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新变化让传统的蓝绿政治格局面临一定挑战。在2016年“总统及立委”选举中,台湾青年的踊跃投票和积极参选更是进一步冲击了台湾传统的蓝绿对立的政党政治格局。国民党在“总统”与“立委”选举中双线大败的主因之一就是缺乏青年选民的支持。从“立委”选举结果来看,除了民进党的大胜与国民党的惨败之外,最为突出的就是以青年群体为主力、标榜第三势力的时代力量的崛起,该党首次参选便赢得5席成为“立法院”第三大党。另外,国、民两大党之外,蓝绿阵营中除了亲民党赢得3席,新党、台湾团结联盟等都一无所获。整体来看,随着台湾社会庞大的青年群体逐渐从“远离政治”转向“参与政治”,摒弃蓝绿观念、代表青年新世代的第三势力崛起的态势日益显著。对于广大青年选民而言,早就厌烦长期以来的蓝绿恶斗,更愿意在国民党与民进党两个“烂苹果”之外可以选择能够真正维护、代表自身权利的新势力。蓝绿阵营长期二元对立形成的严重社会对抗,让越来越多的民众感到厌烦,这是青年世代政治参与的政治根源。^[10]

青年政治参与带来的第三势力的崛起对于台湾传统蓝绿对立的“两党制”格局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但这种冲击效应能否持续发酵以致推动台湾的“两党制”转向“多党制”，这个问题还有待继续深入观察。一方面在于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热情能否一直持续下去，一方面也在于代表第三势力的政党（时代力量）能否不断获得民意的支持。在台湾青年政治参与新态势的影响下，台湾传统政党政治的运作模式也遭遇新的挑战。随着新媒体式的组织动员模式的快速发展，传统的金钱政治、宗族政治、派系政治等组织动员模式也面临转型的压力。网络新媒体的高效、便捷使得选民可以即时获取、传送各类政治信息，选民之间、选民与候选人也能便捷、直接地进行交流沟通，在两次选举中这种“网络政治”的营销模式都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台湾传统政党政治运作模式的“市场份额”。总体来看，青年政治参与新态势对于台湾传统政党政治运作模式的影响目前尚不十分明显，但是，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人们参与政治过程的渠道、利益表达的方式、利益综合的主体、政策执行的路径和政治反馈等行为模式都将出现新的变化，这是影响未来台湾政党政治发展形态和走向的重要因素。^[11]

（二）促进台湾主要政党的革新化与年轻化转型

随着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热情不断高涨，青年的投票参选率较以往有显著提升，青年群体逐渐成为影响甚至是决定选情的关键力量，在选举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鉴于此，台湾各政党为了获取青年的认同与支持、赢得选举，都着力推动政党的革新化与年轻化转型，以迎合青年群体青春活力、革新进步的特征，努力拉拢青年力量。

首先，青年群体富有活力与创新精神，天然就是普世价值的追随者，追求“革新的政党”“民主自由的政党”。国民党之所以屡次在青年选民的争夺战中落败，不能说它没有重视青年，但其固有的僵化守旧、封闭传统的形象，与充满创新活力、朝气蓬勃的民进党相比，不免显得相形见绌，从而难以获得青年群体的认可。因此，在青年政治参与程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国民党也开始走向革新的道路，逐渐淡化原有僵化腐朽的政治价值，转而强调开放、公平、正义的革新理念，努力推动民主、自由价值指向的转型，国民党在党产处理上的措施就显示了一定的革新决心，但尚有待深入推进；而民进党虽然一直标榜“民主”价值，但其长期以来搞“台独”、搞“民粹”的形象也招致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反感，因此民进党也面临着革新转型的需要，若要赢得更多青年支持，民进党必须努力淡化甚至改变其“台独”色彩。

其次，作为年轻人的青年群体大多追求年轻化的政党，因为政党年轻化意味着不用论资排辈，而是以能力标准来决定晋升发展，也代表着政党的与时俱进。近年来随着台湾青年在政治参与上的表现越来越突出，台湾主要政党也加快了各自党内的年轻化转型，重视党内青年参政。国民党与民进党都积极吸纳社会优秀青年，鼓励推动党内青年军力量的发展，加快政党内部的世代更替。例如，国民党为了大量提拔年轻人，出台四分之一条款，要求40岁以下的年轻干部不少于各级干部总量的四分之一^[12]，而民进党更是青睐于社会运动的青年领袖，如现任民进党青年部主任29岁的傅伟哲之前就是“反服贸运动”的学生干部。

（三）推动台湾“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念的社会化与再教育化过程

2008年马英九上台以来，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仅契合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主题，而且深切符合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推动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重要内容。8年来，两岸双方签署了21项协议，两岸人民都充分体验到了和平发展的成果。但是，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并取得阶段性成果，发展红利受益不均的矛盾在台湾逐渐凸显出来，国民党“权贵阶层”以及台湾各大财团被认为是两岸协议的最大受益者，而台湾相当一部分群体表示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感受不深，有些甚至是无感或者反而感到压力，作为“待业族、青贫族、无壳族和垫底族”的台湾青年群体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马当局的施政无能，再加上台湾经济的长期低迷，导致台湾青年的境况持续恶化，现状满足感持续降低的青年群体开始通过组织和参与各类社会运动来发泄不满与不安情绪。在一系列社会运动的直接刺激下，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提升，迫切希望运用自身的力量来推动社会与政治变革。在2014年“九合一”与2016年“总统立委”选举中，台湾青年群体就直接通过投票或参选表达了对当局执政的不满以及改变社会不公平现状的要求。

值得强调的是，2014年“九合一”和2016年“总统立委”选举中国民党的失败虽然一定程度上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产生了负面影响，但绝对不能作出台湾青年反对和平发展的结论，归根到底国民党当局的惨败属于台湾青年对于马执政当局长期不满情绪的一种正常宣泄，同时也离不开“绿营”甚至“台独”势力刻意煽动炒作的的作用。相反，在“反服贸”“反核四”“白衫军”等一系列社会运动的推动作用下，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程度得到广泛提升，而随着青年参政水平的提升，青年政治参与可以成为一次很好

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战略的再教育过程。^[13]近年来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程度的提升,不仅体现在“量”上,政治参与广度的全面增强,而且更体现在“质”上,政治参与强度不断凸显,从动员参与走向自动参与,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于此背景下,台湾青年不仅政治热情被充分激发,而且政治自主性得到显著提升,在政治上有了独立的思考与选择能力,逐渐培养出政治理性,不再轻易冲动或被煽动。在不断政治参与的过程中,随着参政水平的提升,逐渐走向政治成熟的台湾青年会慢慢清醒、理性地看待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认识到和平发展是一条维护两岸人民根本利益,最终解决两岸问题的正确道路。同时,没有历史思想包袱的年轻人也将更加容易客观地认识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充分契合当前国际形势与时代潮流,它绝不仅仅是大陆发展的需要,也不单是国共合作的两家之言,更是包括台湾青年在内的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归宿。

参考文献:

- [1][4][9] 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 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 [M]. 汪晓寿、吴志华、项继权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12、13、7.
- [2] 施雪华. 政治科学原理 [M].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1:782-790.
- [3] 景跃进、张小劲. 政治学原理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284.
- [5] “九合一”选举投票行为调查 选后民调分析记者会会后新闻稿 [EB/OL]. 台湾智库网, 2014-12-03. <http://www.taiwanthinktank.org/chinese/page/5/0/61/2909>.
- [6][8] 2016“总统”大选后:台湾民众对新政局的期待 民调记者会会后新闻稿 [EB/OL]. 台湾智库, 2016-01-21. <http://www.taiwanthinktank.org/chinese/page/5/71/3086/0>.
- [7] “政党表现·两岸关系·318学运周年与第三势力”趋势调查发布记者会新闻稿 [EB/OL]. “新台湾国策”智库, 2015-3-18. http://www.braintrust.tw/article_detail/2046.
- [10] 黄皖毅. 从“九合一”选举看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5(10):78-81.
- [11] 刘国深. “九合一”选后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未来趋势 [J]. 台湾研究, 2015(01):25-28.
- [12] 刘亚琼. 台湾国民党和民进党的青年争夺战——以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为视角 [J]. 青年学报, 2014(01):26-30.
- [13] 刘国深. 台湾青年政治参与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影响 [J]. 中国评论, 2015(03):16-19.

New Situation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Taiwan Youth and Its Influence ——Based on Analysis about Two Elections in 2014 and 2016

Huang Jichao

(Institute of Taiwan Research,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fter experiencing a series of social movements, such as “sunflower”, “protest over Hung Chung-chiu death” etc., obvious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aiwan youth, epitomized by the positive performance of youth in the two important elections in 2014 and 2016. Under the influence of youth-led social movements, Taiwan youth'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resents some new features: the level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mprove significantly, including improvement in participation breadth and intensity, participation from mobilization to autonomy, participation from out-system to in-system, having a coexistence state of institutionalized participation and non-institutionalized participation, network new media having become an important organization form. In addition, new situation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Taiwan youth have produce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aiwan's political situation as well as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raise level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aiwan youth firstly have some impact on Taiwan's traditional party politics; Secondly it is to promote and accelerate the innovative and younger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s main parties; Finally, the expansion of Taiwan youth'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lso helps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socialization and re-education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Key words: Taiwan Youth;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New Situation; Election

责任编辑 曾燕波